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三二期 ——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2d)

| | | |
|--------|---------------------|-----|
| 【拒绝遗忘】 | 《文革受难者》作者独家回应宋彬彬道歉 | 韩福东 |
| 【劫后反思】 | 吐尽狼奶、开口奶：从宋彬彬道歉说起 | 朱学勤 |
| 【史海钩沉】 | 把史实搞清楚是最重要的 | 卜伟华 |
| 【读书札记】 | 徐景贤是个“好教师”——读他的最后回忆 | 丁学良 |
| 【狰狞岁月】 | 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 | 谭合成 |
| 【往事非烟】 | 在“写作组”的日子 | 龚 斌 |
| 【文革一页】 | 在大连，他给林彪当贴身勤务兵 | 刘永路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拒绝遗忘】

《文革受难者》作者独家回应宋彬彬道歉

• 韩福东 •

王友琴是著名的文革史专家，对文革期间的暴力杀戮尤有研究。1995年，王友琴在香港发表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对北师大女附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的事件描述甚详，其中也提到宋彬彬的责任。这之后出版的《文革受难者》更有2万字篇幅讲述卞仲耘之死。王友琴本人是北师大女附中1968届高中校友

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中提到：“90年代以来，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笔下，我成为‘八五事件’的责任人。这个说法更被国内外多人援引而逐渐扩散。”其所谓的“文革研究者”应包括王友琴。

日前对王友琴进行了专访，我的问题是：你对宋彬彬道歉事件是怎样看法，对卞仲耘之死的责任认定有无新意见？她对此做出最新回应。我原拟对卞仲耘之死事件来龙去脉进行深入调

查，因故放弃。因此前答应王友琴将刊发她的答复，故立此存照。王友琴的观点并不代表笔者。

以下为王友琴的回应：

宋彬彬的责任比我在《文革受难者》书里写的要大。该书在2004年出版，“卞仲耘”是其中一章。2004年后我找到了新材料：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斗争”五名学校领导人，是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预先安排的；而非自发兴起的。

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建立于1966年7月13日，主任是当时派到该校的“工作组”组长，宋彬彬和刘进是副主任。7月底工作组撤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仍然执掌学校，副主任宋彬彬刘进继续使用工作组长使用过的办公室。8月5日上午，“文化革命委员会”通知此时已成“黑帮”的原校领导人，下午要对他们开“斗争会”。

那天下午高一（三）班学生最先押解胡志涛副校长到达操场并在那里开始对她施暴。其他四名校领导陆续被押到后，把五人都揪上了高台跪下，开始“斗争”他们。经过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卞仲耘校长死亡，其他四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校长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前年，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向我出示了在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大会上戴过的红卫兵袖章，上面盖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圆形公章。还有一名红卫兵说，她用这个公章给8月5日被打伤脊椎骨的胡志涛副校长开了“证明信”去医院。可见，在8月18日那一天以前，该校红卫兵的权力建制已经相当完备。

此外，了解到更多的受难者死亡时间，也更清楚地表明了宋彬彬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带来了暴力全面升级的后果。例如，在1966年8月18日大会之后的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被关在校中遭到连续殴打，20日中午死于全校“斗争大会”上。《文革受难者》书中写到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中学生田钺被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活活打死。当时没有能知道在哪一天被打死。现在知道，田钺是8月19日被打死的。在8月18日前北京有两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之后则有1，772人被打死。

从2008年末开始，红卫兵中的一些“否认派”（“Deniers”）发表文章，否认《文革受难者》书通过寻访实录下的红卫兵暴行。他们声称我写的文革是“故事”不是“历史”。究竟谁是“故事”，谁的是“历史”？希望这次关于“道歉”的讨论能帮助大家了解。而更重要的是，对红卫兵暴力行为背后的大规模群体性迫害的哲学和原则，今天的人应该有否定的共识。我的看法是：不能否认红卫兵暴力的事实；必须否定红卫兵暴力迫害的哲学。

为平衡起见，读者可参阅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见本刊zk1202b——编注）。

□ 来源：作者博客

【劫后反思】

吐尽狼奶、开口奶：从宋彬彬道歉说起

• 朱学勤 •

为青年时期的红卫兵行为，陈小鲁道歉，很受欢迎，宋彬彬团队跟进，却饱受讥讽，激起新一轮质疑。一前一后，冷热不一，这是为什么？

按说有道歉总比没有好，但王晶珪老先生作为卞仲耘老师的丈夫，至今不接受这一道歉，确实有他的道理。

宋彬彬团队是在看到陈小鲁道歉受到人们欢迎之后，才有此次行为，并说“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如此“择机”行事，一开口即引起人们怀疑，至少是欠缺诚意。陈小鲁与宋彬彬不一样，前者既无血案纠缠，亦无舆论压力，是主动道歉；后者则因卞案被舆论追讨多年，此前曾有过很多次“机会”说而没说，已经陷于被动。最为重要的一次是2007年北师大女附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大典，将她1966年8月15日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再度展出，正面肯定这一“政治符号”，并表彰其为荣誉校友。宋彬彬当时如能断然拒绝，并主动向王晶珪老先生道歉，那是她此生卸下文革杀人重负，赢得社会原谅的最好机会。师大女附中应该说是个好学校，名列“重点”，区区中学校庆，竟能在通常是举行国家盛典的人民大会堂进行，亦可称史无前例。但这种学校谄媚权贵，也有其红色传统，源远流长。文革第一血案出在这种学校，与此类传统不无关系。校方2007年的惊人举动，虽无耻，但在今日大陆并不令人意外，只是在延续那种遗风余韵，其来有自，于今为烈。令人惊骇的是宋彬彬当时的反应，她竟然是欣然接受，而不是断然拒绝！接受这样的谄媚，等于向社会宣布她还是在肯定文革，肯定“红八月恐怖”，对自己文革中“8-15”这一政治符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对王晶珪老先生的二次伤害，也是在整个社会尚未愈合的“红八月恐怖”创伤上再度撒盐。2007年之后整整六年，她始终沉默，只是到了这一次陈小鲁主动道歉赢得欢迎，她和她的团队看到了“机会”，才策划了此次举动。而在此次道歉中，也只是向卞仲耘塑像鞠躬——这当然值得欢迎；但拒绝向活着的血案苦主及其家人道歉，却有悖常理，难怪王晶珪老先生不接受此次道歉，外界舆论也难以原谅。

退一步说，即使把陈小鲁道歉得到社会欢迎看做是一次“机会”，也不是不可以跟进。但不能说“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应该说“为此前一再错过道歉而道歉”，尤其要为2007年那一举动而道歉。1966和2007，这两个鲜红的记忆对人刺激太深，人们当时难以在纸媒上公开表达愤怒，今天群起质疑，只不过是压抑已久的反弹，宋彬彬及其团队应该有所预料？我为宋彬彬错过真正属于她的机会可惜，也为她的团队能这样抓住“机会”——按说智商不低，却如此低估1966、2007积压的民间愤懑而遗憾。

还有一些地方也同样令人不适，举例而言有三：

一，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谁？这一要害她和她的团队还是在回避。就目前所知的情况看，我相信宋彬彬并不是直接杀人犯，但以她当时担任的校文革职务，事发后曾专门为此向北京市委汇报，2002年起她和她的同伴还专此回国调查，已经查明并说出凶手所在的年级、甚至班级，不可能不知道直接肇事者是谁。要说她们对此事负有“领导责任”，这一责任就是尽快将真相公布于人，不能再拖了。48年来，她和她的同伴始终在回避，直至此次“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还是不说，这就难怪人们评论这一次不是“道歉”，而是给宋彬彬个人洗刷。究竟有何难言之隐？人们始终在猜疑，网络上出现了不止一个被猜疑者的名字，如果这些同学是被无端猜疑，她们也是受害者；如果她们确有其事，则应该有勇气指认。不说清真相，不仅是对苦主欠缺诚意，也是对无辜被牵连者不负责任。可以为自己洗刷，但也应该为无辜被牵连者辩诬，最有说服力的洗刷与辩诬只有一途：直面事实，说清真相。总不能只有受害者，没有施害者？至于施害者当时是否到追究法律刑责的年龄，那是另一回事。

我完全赞成徐友渔要求“国家道歉”，但也注意到宋彬彬团队立刻抓住这一正当呼声，来为

她们自己的责任开脱。须知“国家道歉”与追问凶手并不矛盾，两者不能相互掩盖与抵消。这在战后以色列人全球追寻纳粹凶手、德国政府开庭审判柏林墙士兵开枪案，都有前例可循。而在今日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先有“民间追凶”，而“国家道歉”却迟迟未现，前者对后者呈倒逼态势，尚未知何日能实现。这也是当下中国的特殊国情，不应如此，却已然如此。我们当然不能放松对“国家道歉”的呼吁，但并无理由以此呼吁来转移甚至抵消民间追究命案真相的正当申诉。即使将来有一天实现了转型正义，人们终于看到什么叫“落实政策”，什么是“国家道歉”，鱼目不能混珠，但致死人命的真相、凶犯还是要追问，也一定会追问。现在人人都会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也是一个很可能鱼目混珠的问题。要害是看谁在说：如果是受害者说，那确实是宽恕，是容忍；如果是施害者说，那就不是宽恕，而是借宽恕而为凶手避罪，是残忍。宽恕与避罪，容忍与残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南非曼德拉与图图大主教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真相”置于“和解”前，没有真相，谈何和解？

二，“没有保护好校领导”？这句话可以从宋彬彬当时担任校文革副主任这一角度得到部分解释，但也激起人们反感，实属不当。这是上级对下级说的官话，不宜在这种场合说，更不能以学生身份说。也许她是习焉不察，我周围的老师、学生则普遍感觉刺目，相当不满。正常校园内是老师保护学生，只有文革反常，才会出现这样的颠倒：特殊学生手掌权柄，老师乃至“校领导”匍匐其下，需其“保护”。这件事的本质是学生打老师致死——践踏千古文明底线，而不是官僚科层制的责任伦理——“领导”要“保护好被领导”。宋彬彬如果对当年有足够反思，应该从学生对老师的谦卑角度说，而不是从“领导保护被领导”的居高临下角度说。实在要说，首先应该对1966年8月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怎么会“对校领导”有“保护”之责，心存羞愧，而不能顺着这一“领导之责”向下说。这样居高临下的口气，她恐怕都已经无意识了，但人们联系2007年那一幕，却多少听出那一代人从历史深处飘过来的红色优越感，余音袅袅，五十年未歇。

三，不当言却又贸然言之者，牵出其父特殊身份。她本意恐怕是想维护其父一代人的光荣史？却牵动当下“我父是李刚”之历史纵深，同样是触犯众怒而不知。今日大陆，官方设有敏感词，民间也有敏感词，两者对位而立。如“我父是李刚”，代入任何名氏，都会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弹，可见她去国日久，已感觉不到今日官民矛盾已发展至何等地步。即使不去国，这一代人中又有多少能体察民意民愤？那种与社会感受完全相反的自我感觉，常常不知轻重，一语既出，舆论哗然。她们早就坐在火山口上，只是因火山迟迟未爆发，却自以为坐在红地毯上。如李小琳去年在两会期间居然提议要给社会民众建立“道德档案”，浑不晓她自己的家世背景早已被社会“道德档案”钉立在哪一根耻辱桩上，真不知今夕为何夕！

宋彬彬当然不是李小琳。从她此次七百言道歉却不止一处失言，我反而感觉她并不是一个用心很深的人。红二代、官二代中，她并不是最坏，至少不是那种鲸吞全民财富创下离岸天文数字的人？甚至真有可能如叶维丽所言是个单纯的人——脱离社会的人，不知轻重的人，一再触犯众怒却浑然不晓的人。帮助她设计此次“机会”的团队也不整齐，不宜一概而论。如刘进应对公众质疑，竟然把卞仲耘血案的直接责任归之于“群众运动”，这与当年在大喇叭中说——“死了就死了”，有何差异？即使今天不在官位，却还是这样官腔官调，四十八年了，有何改变？拉“群众运动”为少数权贵子弟的野蛮行为来垫背，既不应该，也不符合当年的事实。我是1967年秋天进入中学的，当时“红八月恐怖”已过，校园内蛮风尚存，那些人不可一世的狂暴气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难以磨灭；但大多数平民子弟受正常家庭传统家教约束，即使在那样的反常年代，并不敢出手打老师，对特权子弟的暴力行为则惊惧在目，屏息而不敢言。相形之下，叶维丽将她们“红色大院一代”少年时吸吮的狼奶，反思至上世纪毛泽东赞颂湖南农民运动，则准确得多。同样是在说“群众运动”，刘进还在从正面说，叶维丽已经知道从负面说，不能拉“群众”来垫背，这就是进步，哪怕是些微的进步，也应该肯定。

由此，我不希望社会愤懑聚焦于她们个人，宋彬彬反思不到位，刘进拉“群众运动”来自辩，这都可以给她们留下时间，继续等待。当务之急，是将理性反思引向历史纵深，那一页历史掩盖太久，不仅是一个人的无意识，也是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这一代人今天正集体走上高位。所谓“刮骨疗毒”，毒既在骨，也在血，是胎盘里带来的病毒，病毒不止一次地变异，变异的病毒更凶险。这不仅是眼前的PM2.5，而且是变异后发作的H7N9。少年时吸吮的狼奶，那是开口奶，不会那么容易吐尽。无论是倒逼，还是等待，这个国家一定要吐尽这口狼奶、开口奶，这不仅仅是她们或他们几个人的事，也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能否换骨脱胎，拥有一个健康的未来。

2014-1-30除夕

□ 原载《影响力网》

~~~~~  
【史海钩沉】

把史实搞清楚是最重要的

• 卜伟华 •

去年，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重印我的《砸烂旧世界》那本书的机会，我对书中的一些瑕疵作了修订，其中一处就是关于师大女附中的。

原文是：“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将本校副校长卞仲云（女）殴打致死的恶性事件。”修订为：“师大女附中出现了学生将本校副校长卞仲耘殴打致死的恶性事件。”就是将“红卫兵”改为“学生”。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1966年8月5日的时候，师大女附中实际上只有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而这个组织的人员当天并没有参与对卞仲耘等校领导的批斗、殴打活动，如果说是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将卞仲云殴打致死，显然是不对的。

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晚一些却人数众多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也就是刘进、宋彬彬所参加的那个红卫兵组织，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说出它成立的准确时间，但根据本校亲历者的回忆，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该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是在1966年8月上旬到8月18日之间，虽然多数人倾向于是在8月5日之后，但我们还是不能将其视为定论。在不能确定8月5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否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下结论说是红卫兵将卞仲云殴打致死的，至少是不够严谨的。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文革初期一个影响很大的事件。有人说，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受难的教育工作者，其实是不准确的。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于1966年8月3日被本校学生从家中拉出去批斗、殴打，在残酷的“游斗”过程中死亡。李敬仪遇难的时间比卞仲耘早两天。她的丈夫是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当时已被公开点名批判），也被一起拉出去批斗，遭受殴打，受尽了折磨，于两天后去世。

与北京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一样，对李敬仪之死，也有不同的说法。据南京师范大学（即以前的南京师范学院）网上的《百年校史》介绍：“在‘红卫兵运动’和‘斗、批、改’运动中，一部分干部、教师、学生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摧残，其中校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及其丈夫、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等人被残酷折磨致死。”有亲眼目睹惨案发生的当年在校学生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

“吴夫妇惨死时，南师还没听说‘红卫兵’的概念，何谈死于‘红卫兵运动’？他们惨死之日（8月3日）命名的‘八·三事件’，是当年师生都一清二楚的事件，而南师‘革命造反’的红卫兵成立于八月下旬，这才是红卫兵运动开始的标志。”〔1〕

我认为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怎么可能在没有任何红卫兵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出现红卫兵运动的受难者呢？

值得注意的还有北京二十六中校长高万春之死。王友琴在《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教师》一文中介绍说“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2〕

可是后来范世涛根据可靠的史料，写出《关于高万春之死及其它》〔3〕，考证出当年并不是二十六中红卫兵开会斗争的高万春，而是该校的一个叫做“赤卫军”的工人组织召开了批斗高万春的大会。

二十六中高三某班的团支部书记，一个学生党员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高万春当晚被打的情况：

晚上开追悼李春长同志大会。李春长同志出身贫农，他是被高万春、丁连信、冯大同等黑帮逼死的。他们迫害他染重病，一直对他百般刁难，使心脏病益加严重，最后死去了。会上，李春长的哥哥、李春长的爱人控诉26中黑帮的罪行。会场上不断爆发出愤怒的呼声：“打倒高万春！”“为死难的阶级弟兄报仇！”当把黑帮押上来的时候，群众拥上前去，狠力打去，那伙黑帮拼命逃窜。

这次大会是由赤卫军（我校工人组织）组织的。〔4〕

这篇日记清楚地记述了高万春死前遭受批斗、殴打的情况。高万春是在该校工人组织“赤卫军”组织的斗争大会上遭受批斗、殴打后自杀身死的，以前那种说高万春是在被红卫兵斗争后自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也许有人会问，你对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所作的修订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认真严肃的态度。文革历史本身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加之文革历史档案的封闭和现在的舆论导向不敢正视文革历史，总是企图掩饰或淡化这段历史，文革史的研究环境相当严峻。我们在对待每一条史料时都必须慎之又慎，反复求证，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差错。当年写作本书时掌握的史料有限，出现差错在所难免，一旦有了新的史料，知道了过去的差错就应该尽早纠正，以免谬种流传。可能有人会批评说，你是在为老红卫兵辩护，企图掩饰他们的错误或罪过。可能还会有一些其它的更为严厉的批评，对此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想说的是，对我本人有何误解并不重要，把史实搞清楚，搞准确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会说，即使不能确切认定当天打死卞仲耘的人是红卫兵，那么参与批斗、殴打卞仲耘的人中会不会有人后来成为了红卫兵呢？我不否认有这种可能性。但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述说时，我只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南京师范学院八三事件的亲历者对其母校《百年校史》提出的质疑，范世涛对北京二十六

中校长高万春之死作出的考证，在我看来都是很重要的。他们对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推进文革史的研究都作出了贡献。

在文革中，以至于文革后的很多年，关于宋彬彬杀人的传说可以说是纷纷扬扬，五花八门，有人怀疑，也有不少人相信。现在我估计大多数人是不会再相信这个传说了，但不可否认，现在仍然有人在继续充当这个传说的传播者。

网上有一篇《袁腾飞讲文革》，其中讲到了这个传说：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六次接见红卫兵，全国铁路系统大瘫痪，全国的红卫兵涌向北京，要瞻仰毛主席。我三舅舅当时串联全国，周游全国花了二十五块钱，13块钱还买了条裤子，我来瞻仰毛主席，你问我要钱，就是反革命。毛主席有个特点，比较热爱女青年，当时毛主席问一戴红袖章的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回答：宋彬彬，彬彬有礼的彬彬。毛主席一挥：革命要武斗，不要彬彬有礼！结果小女孩改名叫宋要武。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跑到美国去了，他爸爸是宋任穷上将。文革的这帮人为什么没有罪恶感啊？因为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停着呢，他是伟大领袖，他让我们这么干的。他没罪我有什么罪啊。就跟日本人一样，天皇没罪我有什么罪，我打仗为谁打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宋要武打死了七个人，现在在美国皈依佛门忏悔呢，来世变个苍蝇啊，跳骚啊，或者就永世不得超生了。非常可怕。所以这么一来，事情玩大了。（5）

袁腾飞是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将来的孩子们如果都听着这样的历史课来学习历史，来了解文化大革命，那该是一个多么可笑而又可怕的事情啊。

（2014年1月4日）

注释：

- （1）见《平常旅程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01bc73801010c5u.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801bc73801010c5u.html)）。
- （2）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教师》。载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 （3）范世涛：《关于高万春之死及其它》，载《记忆》第87期。
- （4）范世涛：《关于高万春之死及其它》。
- （5）《九大山人 china 的博客》（<http://blog.travel.ifeng.com/article/5415187.html>）。

□ 来源：《共识网》

~~~~~  
【读书札记】

徐景贤是个“好教师”——读他的最后回忆

• 丁学良 •

这里的“徐景贤”并非香港或内地某所大学的教授，而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皆知名、上海皆听命的“毛主席的好学生”，外号“徐老三”者，即在上海权力系统中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二者绝大多数时间在北京直接为毛泽东江青效命）、官至中共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这里称徐为“好教师”，也不是基于华人世界教育界的选举加冕，而是基于他生命之末的一部手稿，刚刚由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发行的《徐景贤最后回忆》。

此前徐也有一本回忆录在香港发行,《十年一梦》(2000年完稿,2003年出版),外界反应不差。但其时徐并不知道上帝还允许他在人间逗留几许,所以很多事不敢揭露,很多话不敢直言。临终前不久的文稿却很不一样,直率得多,智慧得多。此乃常人之常情——生命越靠近尾段,反思越是深沉,落笔越少顾忌。你已经把一生的路走得所剩无几,干吗还要吞吞吐吐?

徐在“文革”前就已经是左派阵营的一员干将,乃是令全国文化界畏惧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丁学雷”之首笔。好在他“文革”末被清洗,判刑18年,否则我们也无缘读到他深刻的反思。个人之不幸,往往是大众之福气,不然的话,所有以前的中国高层政治真相,大概永远出不来。你见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回忆录了?当然没有,但我们都能读到张国焘、龚澎、陈伯达、邱会作、李作鹏、赵紫阳等人的回忆录。在自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政治传统里,只有倒霉下台的领导人才会真诚反思出版接近事实的回忆录,在台上的只会讲官话套话假话。

徐《最后回忆》里有几处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他首次公布了一份珍贵的文革史料——1968年徐组织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对毛泽东夫妇为什么选定上海作为发动“文革”的基地、该基地是如何不负毛望、文革最狂乱的头两年上海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了详细的考证和纪录。这份资料一交给张春桥,就被当作密件封存起来,因为它透露了在那个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时期,文革得益派绝对不想见阳光的诸多内幕。这份资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是理解和撰写文革关键环节的基础性依据。

本书更吸引我的,是徐对几个文革要人的近距离观察和描绘。徐早年是个文学青年,写过小说和电影剧本,会看人也会写人。他笔下的张春桥之城府深黑、谋算精细、害人整人专业老到、揣摩毛泽东意图十拿九稳,都写得有板有眼。他笔下的姚文元之“棍心勃勃”(即自觉担当毛泽东夫妇横扫中国文化界的“革命大批判棍子”、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待己待友都寒酸克扣、对敌人对家人都不讲温情,也写得有分有寸。

然而从政治反思的角度看,徐写得最好的人物,乃是王少庸。王的资格颇老,1949年后高就青岛市长,不久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被卷入“向明反党集团”案,坐牢几年。后被左派中的大明星柯庆施(毛泽东尊称他为“柯老”,想以他替换周恩来作总理)搭救,安排在上海市委里主管工交系统。文革一开始王被打倒,颓唐之极。徐受上面的委托去劝王通过深刻反省、猛力揭发别人,争取被早日解放进新的领导班子。张春桥随后指派王掌管上海的政法和专案这个权中之权,在张本人太忙缺席期间,一度让王主持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的会议。徐描述:“王每天抽两包中华牌烟,脸色灰暗。他喜欢讲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谈到别人的历史问题时,经常眼睛一鼓,嘴巴一撇,拿起笔来在书面报告上哗哗地写上批语:‘隔离审查’”(页165)。被王坑害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位就是王的同事的丈夫叫张六吉,仅被怀疑跟一起群众对王提意见的冲突有关,王就指示手下立专案伪造证据,严刑拷打张六吉,逼他供认解放前认识国民党特务。张六吉走投无路,自杀了结。

徐评论道:“像王少庸这样1930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历经长期的党内斗争,挨过自己的整,因冤案被关押多年……”

可是他一一旦重新掌握大权,很快故态复萌,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党内斗争,(对一大批人)设立专案,长期关押,下手又狠又辣。”全上海的死刑案也是王审批,“肯定错杀了一些人。我反复思索,觉得这种‘王少庸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阶级斗争学说从思想上长期统治共产党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王少庸是从这个国家里消失了(病故),但是,王少庸现象和专案遗风是否从此绝迹了呢?”(页179—180)

重庆和许许多多地方近年来的受害者们大声回答：没有绝迹！当然没有！因为我们这儿有大大小小的王少庸！薄书记不也是一个超级王少庸吗？

关在秦城监狱里的薄书记大声回答：那能怪我吗？我现在不也是被专案了吗！

诸君，我称徐景贤为“好教师”理由便是：他书中有多处这类依据实例的反思，使得他《最后回忆》一书，可以用作当代中国政治课的生动教材。

徐书中另一个亮点（页296—307），是从多方信息来源，证实了最早由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详细披露的1973年底批判周的重大事件。综合徐高二书提供的新旧细节，毛泽东去世前对资格最老的同事发动的这一政治攻击，可圈可点之处有：

——1973年11月17日，毛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主题是批周在对外事务中“严重右倾、修正主义”，“目无中央、欺骗主席”，“屈膝投降、丧权辱国”。

——毛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女人交了底，说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江奉旨批周是“第11次路线斗争”（刘少奇是第9次，林彪是第10次）的头子，是“贼船”的老板；唐传达毛对周的批评长达8个小时。

——在十几天的批判会期间，每天深夜要用铅笔把原始会议记录一字不漏地抄写成大字（为保密不交印刷），送视力差的毛阅读，毛全程牢牢掌控会议进度和细节。

——毛尤其重视刚复出的邓小平对批周的表态，指定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列席政治局批周扩大会议。老练的邓发言提醒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毛极为高兴，动了找邓作彻夜长谈的念头。十多天后，毛任命邓进政治局，兼任总参谋长。

——周这时已经癌症尿血，要求面见毛，毛不见。江青不许别人帮周写检讨，还当面斥周：“你这个人就是啰嗦！要谈实质性问题！”

——周只好尽量狠批自己，并表态把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权力交给别人。

——毛至此方罢手，会见外宾时对周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毛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这几个娘们后来发牢骚：“他（毛）做脸，我们做屁股。”

——1980年代初，中共中央同意周遗孀邓颖超的申请，当她的面销毁了上述批周会议的全部记录。周逝世前最担心的两个材料，一是毛江于文革中曾尝试用过的“伍豪启事”（伪造的，说周早年背叛革命），另一个便是该次批周会议记录。因为在中共体系里，要彻底毁灭一个高层领导人，“叛党”、“卖国”是致命武器。毛江摧毁刘少奇和林彪，是切近的实例。

读了徐景贤《最后回忆》，你能加深理解，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看重毛的遗产——对于努力奋斗、在当今和未来的中国政治浪潮里图生存谋发展的人，还有什么诸子兵法比得上毛的战略战术，更能教你致对手于死命的绝招，对敌人绝，对同志更绝？

□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文化副刊》2014年1月12日

~~~~~  
【狰狞岁月】

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

• 谭合成 •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道县经历了66天的大屠杀，被杀死4519人，被杀绝的117户，道县大屠杀通过各种媒介，已广为人知。当时道县周边地区也大开杀戒，知道的人不多，现作简单介绍。

◇ 宁远县

宁远县1967年8月18日开始杀人。

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与道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山之隔。郑家大队杀人后，一些四类分子（子女）跑到宁远这边山上躲藏。小欧家大队的一个社员上山打柴，听到冲里有人说话，走过去一看，没有人，却看到地上有人坐过的痕迹，还有几颗“喇叭筒”的烟蒂子，赶快回去向大队支部报告了，很快流言四起：

“道县黑杀团在我们县里开会了，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

“道县的四类分子和我们这边的四类分子串联，准备‘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8月18日（农历七月十三），小欧家大队一个在外面做手艺的外流人员（非四类分子）回家过节，带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大队党支部和群众组织“红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该外流人员和地主分子欧涛玉等四人采取革命行动。当晚便将4人杀害。

自此，杀人风从道县刮到了宁远。

接着，麦地公社路田大队，以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推下废红薯窖，放火熏死后，盖土掩埋。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当时在晓睦塘大队蹲点，听到杀人风声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大队干部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以掌代刀，做了个砍的姿势。但下面有人还没有理解深透，又问了一句：“李书记，你是说……？”大队会计有点文化脑子活接了一句：“死蠢，这都不懂，李书记是讲斩草除根。”李远生高兴地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聪明！”当即分工，全大队按照自然村分为两片，均由支委负责，分头行动。农历八月二十二早晨，以召集地富分子及子女分萝卜田为名，将其骗至预定地点，突然袭击，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家小共68人被推入地窖活埋。

在屠杀中有的家被全家不分老小全部杀绝。清水桥公社吕家大队吕成高一家灭门案中被杀了10人。

弯子里大队是宁远杀人最血腥的一个大队。这个村子不大，村民多数姓郑。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仅仅一个早晨，小小山村就有50多人（主要是地富及子女）被大队干部指挥民兵用乱刀砍死，抛尸地窖。被害人中，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

人凶手用锄头将其切断成三段，塞进窖里。12岁的少年郑山壮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树上躲起来，结果还是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牛做马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17岁的少女郑翠云，因为长得秀气，被本村的几个人拖到大队小学里面轮奸后，活活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寒气逼人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总算留下一条小命。村里三个光棍汉，趁机将三个有点姿色的地富家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堂堂正正”地娶回家来。其中一个女人，已怀孕9个月，因肚子太大，一时不便娶回家，准备生产之后，再娶，后设法逃脱，在外面重新嫁了人，总算逃脱了刀口嫁人的命运。

因隔河较远，河汊分布不及道县丰沛，杀人方式多为刀砍和活埋。

该县文革杀人从1967年8月18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共杀1092人（含被迫自杀），全地区排名第二。

#### ◇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县文革杀人事件1967年8月29日始至10月25日止，历时57天，共杀898人（含被迫自杀）。

8月下旬，道县洪塘营公社地主（子弟）杨铁桥全家5口被杀4口，仅杨只身逃脱，逃跑到江华县湘江公社苗子园大队亲戚家避难。洪塘营公社多次派人前来追捕，同时散布道县杀人情况。苗子园大队干部开会讨论，认为“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道县杀得，我们这里也杀得。于是在8月29日把大队上一名有男女作风问题的富农子弟拖上山投了天坑。在全县首开杀戒。

贝江公社贝江大队，有人提出“阶级敌人全杀光，从此天下就太平”的口号，把全大队所有的地富分子及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杀光。

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在回公社的路上，看到几个地富分子坐在路边抽烟、聊天儿，认为是四类分子开黑会、搞暴动（实际上是出义务工修路，工间休息），立即到公社报告了。公社领导马上组织民兵将人抓来公社，刑讯逼供。连续吊打三天三夜。其中一个名叫江光芳的富农分子熬刑不过，瞎编乱造，供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同时供出成员131名，其中竟然包括公社书记、社长、文革主任。大石桥公社立即顺藤摸瓜，严刑逼供，大肆追查，并成立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审判，杀了14人。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担任过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在其中被执行了“死刑”。

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懃上（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兄）被反复批斗，刑讯逼供，逼他供认江华是叛徒、假党员，虞因不堪凌辱被逼自缢身亡。

该县杀人起步稍晚，动手时6950部队已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封刀时已到年深秋，数量上虽然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

#### ◇ 江永县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开始于1967年8月17日。该日上午，桃川公社石砚大队下放知青王××在江永县城被杀。同日晚，江永县铜山岭农场跃进大队召开全场职工大会，枪毙两名

老“地主”和两名“地主狗崽子”，并吊死一名丧失阶级立场嫁给“地主狗崽子”的青年妇女。农场数百名职工和近百名知识青年被通知到队部禾堂看处决，“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

将该县文革杀人事件推向高潮的是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杨修玉系道县祥霖铺人，大屠杀期间，他回道县探亲，沿途看到河里飘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道县的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公社后，于8月25日召开全社各大队“五巨头”（书记、队长、民兵队长、公安员等五人）会议，把在道县看到的一些情况和道听途说的一些谣言，向各大队的“五巨头”们吹了吹风。所以这次会议又被称为“8·25杀人吹风会”。

第二天，公社又召开各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即贫协）负责人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正在开会，文革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领一些人，敲锣打鼓进了会场，向公社报喜：

“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文革大队贫下中农，粉碎了一次阶级敌人的暴动阴谋，镇压了6名阶级敌人，特向公社报喜！”

会场顿时开了锅，人们再也坐不住了。

“还开什么，文革大队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们落后了。”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还等在这里干什么？赶快回去行动哦。”

一哄而散。纷纷赶回大队部署杀人。三天之内，全社共杀126人。

紧接着允山公社公安特派员张文德为首策划，趁允山赶闹子的时机，以允山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枪毙了该公社的3名四类分子，围观者数以千计。张文德亲自起草杀人布告，布告的落款也很值得玩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贫下中农  
副院长造反派

这张布告，张文德命人抄写几十份，从允山一直张贴到江永县与广西搭界的龙虎关，沿途六十余里，经过允山、回龙圩、夏层铺、桃川、粗石江、源口六个公社，整个江永县为之轰动。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325人（含被迫自杀）。

#### ◇ 双牌县

双牌县文革杀人事件共杀345人（其中被迫自杀48人）。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

双牌县是1970年以后新建的一个县，文革“杀人风”时期叫潇水林业管理局。1978年行政区划调整，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县。该县文革“杀人风”主要集中在理家坪和江村两个公社。潇水林业管理局开始杀人的时间是1967年8月23日，最先杀人的是现已划归永州市管辖的何仙观村（大队）。相传该地为何仙姑修炼得道之处，现为零陵地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由于采访任务的需要，我们每到一处都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公社（农场、林场）或大队。在双牌县我们看到了一只十分值得解剖的麻雀——阳明山林场。这里山深林密，社情复杂，外流人员多，一直是潇水林业管理局狠抓阶级斗争的点，也是阶级斗争抓得最得力的点。文化

大革命中，该林场派性斗争十分激烈，抓的人最多，批斗的人也最多，但是在四面八方都在杀人的情况下，却一个人也没有杀。为什么呢？就是林场武装部长和党委正、副书记在杀人问题上意见一致：他们杀他们的，我们这里没有上级的指示，坚决不动手。

#### ◇ 新田县

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以召开万人大会著称。1967年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较晚，但声势浩大，不留死角，从9月8日起到10月18日止，历时40天，全县21个公社全部都杀了人，其中18个公社（包括城关镇）由主要领导（公社书记3人，公社主任4人，武装部长12人）为首策划、部署、组织召开了19场万人大会杀人。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杀人就要开会，开会就要杀人。全县共杀786人（其中被迫自杀18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0.35%。

与道县不同的是，新田最先大开杀戒的地方是城关镇，即新田县城。是从城镇杀向农村的。9月8日，新田群众组织“联总”在城关镇召开全镇革命群众大会，枪毙了5名“阶级敌人”。“联总”总指挥王雄宏在大会上说：“我们城关镇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在这里杀几个坏家伙，将对全县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总的估计非常正确。这种开大会杀人的方法马上便为下面各区社效法。

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革命亮相干部”肖德雯在他的讲话中没有直接表明对杀人事件的态度，但特意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城关镇万人杀人大会之后，“联总”下属的一个群众组织新田县“湘江风雷”的头头肖邦久起草了一份《紧急倡议书》，在全县范围散发，鼓吹杀人。另一个头头副司令兼县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长雷玉荣，专门组织了一个手枪队，哪里杀人就到那里去支援。

在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当时实际掌握政府权力的县武装部又做了些什么呢？

1967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下发了一个《社情电报》，新田县人武部收到后，专门拟了个通知传达到各公社，该通知只引用了电文的前一部分，即“根据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行动。”而对后一部分“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严惩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只字不提。此时新田县还未出现杀人现象，通知传达到各公社后，不少公社写报告、打电话，或派专人来县请示杀人。其中新圩公社反映，他们那里挖出了“501、502、503反动组织”（假案），要搞暴动。陶岭公社反映，他们那里出了个反革命组织“复兴会”（假案），气焰嚣张，企图复辟，扬言要杀干部、贫下中农。骥村公社武装部长接县人武部通知后，于9月8日，主持召开大队支部书记、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紧急会议，传达县人武部通知。并在会上说：“道县的四类分子进行阶级报复，杀贫下中农，阶级敌人兴风作浪，贫下中农遭殃。我们公社敌情复杂，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该杀的要杀，该管的要管，不杀几个，这股歪风刹不下去。”会后，各大队分头行动，基本上是仿照道县模式，开始杀人，全社共杀48人。枳头公社也在同一天（9月8日）召开公社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公社武装部长主持，并在会上说：“我们公社四类分子很猖狂，他们在秀凉山开黑会成立了反动组织‘205独立师’（假案），他们的纲领是：‘8月15日砍高粱，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

光。’我们民兵要武装起来，镇压阶级敌人。再不动手，我们贫下中农要吃大亏了。”会后，给三个武装民兵排发了子弹，这些民兵背着枪扛着红旗，敲锣打鼓下到各大队去支援杀人。全社共杀113人，是全县12个公社中杀人最多的。

从县人武部的这个通知发下之后，（1967年）9月8日至12日，短短4天时间，全县已有15个公社出现了杀人事件，被杀人数为129人。各方面反映十分强烈。直到这时，县人武部才于9月12日召开全县各公社武装部长会议，传达47军《社情电报》的后半部分，但没有具体提出制止杀人的措施。不但没有起到任何制止杀人的作用，反而在会后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潮，从9月13日到15日三天时间，全县又杀230人，占杀人总数的40%。

#### ◇ 冷水滩市、永州市（零陵县）

这两个市文化大革命时期尚未建市，统属零陵县。

冷水滩市文革杀人事件，除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外，1967年8月12日的一起刑事案件也起到了某种导火索作用。该日，现属冷水滩市的郝皮桥公社庄冲大队尹村生产队队长雷付生与邻居地主子弟郑荣奎因小孩玩火引起纠纷，发生斗殴。打斗中，郑荣奎失手将雷付生打死。郑闯下大祸后，惊慌失措跑到山上躲藏，被大队民兵搜山抓获，当场用石块棍棒打死。8月16日，郝皮桥公社召开群众大会隆重追悼雷付生，声讨四类分子的滔天罪行，要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会上提出“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要坚决镇压”！要求各大队贫下中农行动起来，对郑荣奎这样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采取“果断措施”，打掉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追悼会后，各大队开始杀“四类分子”，并迅速地引发全市性的杀人事件。

永州市文革杀人事件应当说是从富家桥杀开的。虽然此前，早在7月23日，已经发生了黄田铺公社双江桥大队支部副书记胁迫3名地富子弟将地主分子蒋德生父子3人沉河的事件，但该事件一开始并没有被认为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而是视为报复杀人的刑事案件，因而对全市性的杀人事件几乎没有影响。8月下旬，富家桥区富家桥公社永兴桥大队受道县“杀人风”影响杀了该大队3名四类分子。区武装部长唐××接到报告后，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讨论制止滥杀的问题。于是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区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但是会议的气氛与原来的设想有些格格不入，大谈阶级斗争，大谈各种道听途说的敌情，谈到激动处有的干部甚至捶胸顿足、热泪横流。湖南一带农村干部有个好喝几口小酒的习惯，当年的会议餐不像后来安排得这样周到，一般不安排酒水，所以休会的时候，一些干部打平伙买酒喝；酒买了，没有酒碗，就跑到区供销合作社去借。站日杂柜的营业员是个地富子弟，说：“我们这里的碗不能借，只能买。”借碗的干部不高兴了，说：“你一个地主崽子神气什么！”该营业员仗着自己是吃国家粮的，不把农村人放在眼里，说：“不能借就是不能借，这是国家的财产，借给你用过了，还怎么卖？”结果激起了与会干部的愤怒，把他从柜台里拖了出来，拖到旁边的河边上，从二十多米高的桥上扔进河里，淹死了。

这件事如一粒火星落到一大堆干柴上，立即引起一场大火。“屌他老母亲的，一个地主崽子都敢欺负我们！”与会的社、队干部议论纷纷，越说越气，会也不开了，一声喊，纷纷赶回各自社、队布置杀人。三天功夫杀了158人，占全市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 ◇ 蓝山县

蓝山县是整个零陵地区开始杀人最晚的县，（1967年）9月10日才开始杀人，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45人。该县杀人的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该县最典型的杀人案例发生在清水大队。该大队杀人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了村子里一个“蠢子”（脑筋不太灵活的人）去执刀。因这里杀人也跟道县一样有“手续费”，就是给钱或给谷子，这个“蠢子”杀了19个人后，找到大队干部要分谷子。大队会计说：“19个难算，干脆再杀一个凑个整数。”于是这个“蠢子”又跑回去，找到本村一户地主家，把地主家的小孩子随便捉了一个杀掉，凑了20个整数。

#### ◇ 祁阳县

该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用捆绑吊打的办法，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等人扩大战果，组织深挖广查，很快将该组织成员“发展”到600多名。其他各公社积极响应，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其间共杀218人，刑讯逼供致伤致残1000余人。

#### ◇ 东安县

1967年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全县仅杀11人，这在当时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大规模的道县“杀人风”平息八个月后，1968年6月上旬，该县展开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走资派）一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川岩公社在审查一名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时，审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的线索，顺藤抓瓜，抓住了一名叫蒋梧生的外逃地主分子。川岩公社如获至宝，公社书记亲自挂帅，对蒋严刑逼供，“一定要审出点名堂来”，蒋梧生受刑不过，交待参加了“反共救国军”，而且还是个副司令，司令是井头圩公社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伪连长徐嘉，下设三个团，川岩一个团，井头圩两个团，并供出地富子弟黄春恩等15人为该组织成员。情况汇报到县里，县革命委员会高度重视，在县革命委员会统一部署下，全县普遍开展以追查“反共救国军”为中心的三查一清运动，从1968年6月10日到9月13日，95天中，挖出了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刑讯中，打死141人，被逼自杀278人，致伤致残1132人。

在追查“反共救国军”过程中，大搞刑讯逼供，实施了36种刑罚，这些刑罚残忍至极。这些县的大屠杀有几个特点：1、屠杀规模空前，残忍无比；2、被杀者为无辜百姓，纯系冤杀；3、屠杀指挥者为基层政权如武装部、革委会（或革筹）、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机构；4、阶级斗争是屠杀的指导思想，屠杀前制造谣言，说阶级敌人要杀人等。因而被屠杀者中多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制造的政治贱民，如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1期

~~~~~

【往事非烟】

在“写作组”的日子

• 龚 斌 •

◇ 进入市委写作组

1970年下半年，因“文革”停止招生的一些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当了两年知青后，由于在农村“表现好”，被推荐、选拔为首届“工农兵学员”，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自然非常兴奋。

大概一年后，复旦中文系分为评论、创作两个专业。我喜欢创作，几乎不加考虑，就报名进了创作专业。不久，我被上面“相中”，为市委写作组效力。为什么全年级八十多号人，独独看中我，内情当时无人告知，迄今也无从追问。猜想可能是上面认为我政治条件好，是党员，“家庭出身好”，又是货真价实的高三毕业生，写作基础也好。

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舆论阵地，与北京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南呼北应，同是江青一伙控制的写作班子。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掀起阵阵恶浪，是恐怖年代的政治毒瘤，已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在40年前，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威权政治掌控的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打手，规定、指导全市所有的文化、教育、宣传机构的导向，胡作非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先是写评论文章。1972年9、10月间，市委写作组成员刘某、林某，以及W老师、《虹南作战史》作者陈某与我，几个人到市委写作组写评论文章。一到那边，写作组的工人作家肖木就布置任务：通过评论当时出版的《虹南作战史》、《金光大道》、《江畔朝阳》等几部长篇小说，写出“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确立所谓“文艺创作必须为路线斗争服务”、“生活必须服从路线斗争”等极左观点。

市委写作组在康平路。这条路靠近徐家汇，从复旦过去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写作组的头叫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历史系的一个中层干部。可能在为姚文元炮制《评海瑞罢官》一类阴谋黑文中出了力，受“四人帮”青睐，成了市委写作组的头。其人个头大，不苟言笑，挟威自重，官步不慢不紧，让人一见生畏。夜里十点钟左右吃夜宵，偶尔看见朱总管排队在我们前面。他端着食品转身，W老师立刻满脸堆笑，眼镜后面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哈着腰，亲热地叫：“老朱。”老朱不搭话，点点头，表示已听见下属的问候。我跟着老师后面，自然用不到凑上去献笑脸。再说，一个区区工农兵学员，也轮不上问候领导。自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末，时断时续，我在市委写作组一年多时间，很少见到朱总管的面。

◇ 参加《珍泉》的创作

我在写作组最主要的任务是参加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剧本以反映地质队寻找地下水为题材，讴歌为祖国建设而贡献青春的先进人物。写作组专门搞一个创作班子，写这样一个剧本，意图是以“样板戏”为榜样，拍一部有影响的电影，彰显“革命文艺路线”的成果。1972年2月，现代京剧《海港》演出本发表，同时发表大幅剧照、评论文章。同年3月，现代京剧《龙江颂》的剧本及剧照发表。9月，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演出本在《红旗》杂志发表。江青把持的文学艺术领域集中展示“样板戏”的“伟大成果”。市委写作组组织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班子，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1972年12月初，《珍泉》创作组正式开始活动。先去上海郊区住金山张堰镇，熟悉和采访水文地质大队。12月下旬，创作组一行四人出发去安徽，采访南京江浦解放军某工程兵部队，参观马鞍山上海在江苏的工程项目九四二四工地，随后来到铜陵新桥矿。

回上海后，任务重重地压在我的肩头。组里决定先写个初稿，并要我来写。我早就料到事情会这样。我逃不了，反正都得写。于是从1973年2月下旬开始，根据采访所得材料，构思剧情和人物。不用说，剧本以“样板戏”为榜样，主题是先行的，“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必

须遵循的，英雄人物是必须高大的。

3月下旬，剧本完成了一半。硬着头皮上，结果必然苦不堪言。大概在4、5月间，总算写完了剧本的初稿。当把它交给组里时，觉得彻底轻松，好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裹。至于剧本的主要英雄人物是谁，情节如何，矛盾冲突又如何，早忘得一干二净。

5月初，剧本移交到市委写作组。肖木看了，提了不少意见，要求重改一遍。肖木的意见大多中肯，我觉得他的水平不差。修改的工作好像是W老师担当，我过着如释重负的快乐生活。

5月下旬，第二次外出采访。组里原来四个人，这次又多了一个小青年，二十岁出头，圆脸，有点胖，看上去浮肿的样子。一对小眼睛，好像永远睁不开，且目光浑浊。他到剧本创作组没有具体任务，我不明白为什么来这么一个陌生人。

第一站到南昌，采访郊区的一个地质队。记得就是在这里，我和新来的陌生人讨论“样板戏”问题。我说：“‘样板戏’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实际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陌生人把江青的“三突出”奉若神明，坚定地维护“样板戏”，最后同我争论起来。我当时读马恩列斯的文艺理论，读别林斯基和丹诺的《艺术哲学》一类书，眼界稍有开拓，觉得“样板戏”太过程式化，未必符合艺术规律，不能以此规范所有的文艺作品，心里不承认“样板戏”的艺术水准超过莎士比亚，超过契诃夫和雨果。各种宣传机器纷纷赞扬“样板戏”是艺术高峰，比文艺复兴还伟大，在我看来是自说自话。年轻气盛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对“样板戏”发不敬言论，陌生人则维护“革命左派”的理论，反驳我。我对他说：“有些问题不好讲，以后再讲。”陌生人随身带着很厚的马列著作，我也不以为然，觉得走这么远的路，应尽量轻装，不宜带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书。

结果，翌年我遭遇厄运，那个陌生人揭发我污蔑马列著作是“砖头”。后来朱永嘉整我，最主要的罪名就是“攻击江青，攻击样板戏”。当批判会上吃惊于自己居然还有攻击马列著作是“砖头”的罪名时，方才若有所悟：陌生人是来有路的，并且负有一定的使命。

由南昌到瑞金，江西909地质队就在这儿，是重点采访的地方。瑞金的采访工作结束，由赣州至广西柳州，再到巴马瑶族自治州县，然后绕道南宁再至柳州，经长沙、武汉回上海。从5月下旬至7月上旬，前后四十余天。

◇ 对“写作组”产生反感

外出回来没几天，开始放暑假，同学们陆续离校。这时，女朋友来信了，问我何时放假。我因电影剧本要讨论，不能走。已经是7月下旬了。康平路的林荫道上满是火热的阳光画出的梧桐树叶的影子，凌乱斑驳。我在路边彷徨，特别烦躁，真觉得一天也待不下去。最后，终于向剧本创作组提出我要回家。W老师说剧本还要讨论和修改，劝我再留一段时间。我听不进去，执意要走，公然声称暑假是国务院规定的，是学生的权利。他们不同意，不同意我也走了。这件事，到了次年的春天，成了我“犟头倔脑”的证据。

其实，我以放暑假为由，不愿在市委写作组多待一天，有多种因素。想回家，回到女朋友身边，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我未曾明言，也不敢明言的，还有其他因素。

一是以为这个剧本难改，也没水平改。“样板戏”当然是“尽善尽美”，高不可攀。我是工农兵学员，初次写电影剧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出初稿，已经尽力。创作组里有我的老师，有资历比我深的人，让他们来打磨剧本好了。

二是我不敢讲的原因，即对当时掌管文艺的一伙人有看法。在市委写作组，我绝对是边缘人物，是来接受锻炼和培养的小人物，绝对不可能闻知重要的机密。但那种舞文弄墨的氛围，自诩左派的狂妄，常常有的一种“策划于密室”的诡异，多少能感觉到一点。譬如耳边会飘过“（张）春桥同志讲”、“（姚）文元同志昨晚来电话说”之类的消息。每当有这类消息，这里的气氛就亢奋、紧张起来，大家忙着写文章贯彻上面的指示。随之，报上掀起阵阵浪涛，蛮横、凶险，简直要席卷一切。我觉得这儿很像台风之源，一些人在兴风作浪，当今文化艺术界“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全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与张春桥、姚文元一帮“笔杆子”有密切关系。

“文革”初期，我是个思想激进的红卫兵，忠诚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同样舞文弄墨，写了许多大字报，实际上也是极左路线的鼓吹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渐多，阅历渐丰，加上山川胜景的自然美熏陶，开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大好形势”并非“大好”，“样板戏”并非十全十美，江青的“三突出”至多是一家之言……完全说不上清醒，不过是昏睡之后的刚刚苏醒。以前是盲从，现在懂得了质疑。良知安顿在我的心里，被人任意左右的头脑逐渐变得正常。

◇ 厄运很快降临

1974年1月，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我回到了复旦，响应上面的号召，考虑如何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一天，W老师通知我：“市委写作组要你去国棉二十一厂写中篇小说，征求征求你的意见。”我想，既然征求我意见，则说明并不是命令。况且，快要毕业了，两三个月时间也写不成中篇小说。于是回答W老师：“我不去。”我不想去的潜在原因还是上面所讲的，看不惯市委写作组，甚至看不惯整个中国的文艺界现状。或许别的工农兵学员梦寐以求想进市委写作组，羡慕我的“受重视”，但我却感觉不自由甚至痛苦。

过了几天，积淀在内心的厌恶终于形之于声色，我在宿舍里吟了李白的两句诗：“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不解气，又骂一句：“文霸！”殊不知，我的吟诗和骂语被崇明老乡N偷偷记在笔记本上。

厄运很快降临。

1974年3月，由市委写作组头头朱永嘉策划和操纵的围剿开始了。这是大象对蚂蚁的攻击，用大炮轰击蚊子，用牛刀杀鸡，用集团军搜捕一个散兵游勇。

也难怪朱永嘉要用大炮轰击我。一个小小的工农兵学员，抬举到了市委写作组，不仅不知感恩，反而以吟李白的诗以示傲骨，骂自己为“文霸”，这还了得？这不是“右派言论”吗？岂不是脑后长了“反骨”！

突然而至的打击，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批林批孔”，居然批到了一个无名的学生头上。整整两个月，复旦中文系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联系实际”，批一个普通的工农兵学员，宣称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斗争。回想半年前，我是多么坚决拥护、积极响应“批林批孔”，岂料没多久，我自己也成为“复辟倒退”的代表。好一个黑色幽默！

◇ 差点被打成“反动学生”

1974年3月初，课已停止，快要毕业分配。虽然不知道分配的结果，但我很乐观，以为凭政治条件和学习成绩，不到北京，也可能会留校。突然而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自我感觉不啻是梦想，分配给我的几乎是一顶“反动学生”的帽子。

古谚云：“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事实上，山雨欲来之前，几乎没有风，我浑然不觉。这年2月，我还给女朋友写信，问：你们那边“批林批孔”紧张吗？希望你能跟上形势。真是莫大的自我讽刺！

朱永嘉搞政治运动当然是内行，打倒一个学生易如反掌。他以批林批孔须联系实际为名，向下面煽风点火说，学生中的右派言论也要批。他的话在复旦等于圣旨，谁敢不执行？中文系派人调查、收集我的“复辟倒退”的言论，连芝麻大的都捡起来，然后锻炼罪名，准备开动学校广播台造声势，刷大幅标语、大字报“振军威”，逼我“交代问题”。如果态度不好，则开除党籍和学籍，遣送回乡。

从3月15日开始，组织教师、学生围剿，批判会、“帮助会”、检查会接踵而至。我成了“复旦中文系复辟倒退的典型代表”。平日与我谈得拢的几个同学，都不言不语，心事重重。我眼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以异样的眼光躲避我。不意一夜之间，昔日的“革命小将”，成了革命的对象，面对老师与同学的揭发批判。

政治暴力在中文系肆虐。一次一次的“帮助会”、批判会上，一些老师和同学怀着“批林批孔”的“革命激情”，揭发、批判我，个别积极分子还能“火线入党”。平日与我观点相近，交往较多的上海同学C、浙江同学C，也受我的牵连。中文系党总支、支部不断向上海C施压，要他作所谓旁证。C不愿写，上面硬逼着写，并以不写就不能入党相威胁。党总支不放过浙江C，要他作旁证，写检查。“文革”结束后，我同他见过几次面，每次都觉得有一种歉意。城门失火是我的事，为什么要殃及他，使他终生不得志……

3月26日，终生难忘的一天。

生物楼的大教室里坐满了人。中文系的全体师生以及全校各系的师生代表，大约有三四百人，围成一大圈。会议议程是先由我检查，然后接受批判。会上，最主要的两个人物，是两个崇明老乡。一个是我，因言论罪受批判。一个是N，坚定的“革命派”，在小本子上偷偷记录了我的“反动言论”。今天，积极分子终于亮相，公开他那个机密本子，接受“批判批孔”的考验了。他慷慨激昂，把笔记本上的材料有力地抛出来：某月某日，在场的有某某、某某。某月某日某地，又说过什么。真是精确至极的打击，我虽忍受过多次，但每次都感到不寒而栗。在场的数百个师生，对我老乡的慷慨陈词和坚定的革命立场，自然刮目相看，印象深刻。谁能对背后偷偷记录他人言行的勾当不感觉恐惧？他对我的精确打击，诚然让我很受伤，但我受伤一时，他却受伤终生。因为他精确打击了我，也精确打击了自己的人格和品德。这是后话。

会后，有几个同学偷偷告诉我，朱永嘉是发了慈悲的，本来要开全校批斗会。后来查下来，我出身贫农，家里母子三人都是共产党员，以前又没犯过错误，加上认识态度比较好，才缩小了会议规模。知悉内情的人更是直言不讳地对我说：“要是你到国棉二十一厂写中篇小说，就根本不会有搞你这件事。”后来，中文系总支和创作专业的老师几次向我吐露：“搞你的是朱永嘉，不是我们。”

◇ 我的“罪状”

这次批判大会之后，中文系取得了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我则被G在一边，

责令认真修改检查书。检查书已经改了多遍，但总是不深刻，总不能令他们满意。什么文章最难写？恐怕是检查书了。与检查书比起来，论文、小说、诗歌简直小菜一碟。

我独个儿坐在宿舍里，对着书桌上的一堆报告纸发呆。下意识地看看手中的圆珠笔，竹制的笔杆被手指磨得油光锃亮。报告纸上的每一页都涂改得面目全非，自己辨认也觉吃力。我究竟犯了什么天条，罹此大祸？为保持历史真相，下面抄录我在1976年11月给驻上海中央工作组的申诉信：

一、所谓攻击“文化大革命”。我曾在宿舍里和同学议论：“‘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八年了，有些地方还在武斗，看来政局不稳。”又说：“现在的批判文章是千篇一律。”

二、所谓攻击、贬低“样板戏”。我说：“‘样板戏’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实际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三、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某同学在宿舍里说：“江青同志在文艺上不一定都懂。”我马上接着说：“江青同志是不一定都懂么。”

除这三条之外，我还讲：“过去的干部是枪杆子打出来的，现在的干部是笔杆子摇出来的。”暗指张春桥、姚文元、“梁效”、“罗思鼎”之流文化打手。

以上便是我的言论罪的主要“罪状”。上述这些言论，其实许多同学都说过，我仅仅是更敢说，一直说到市委写作组而已。而且，就这么几句言论，根本不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与遇罗克言论的石破天惊相比，简直是小儿语。我质疑“样板戏”，质疑江青的“三突出”，质疑她的“文化旗手”的光环，完全是阅读和思考的结果，仅仅是表示一点怀疑，决不是“攻击”。江青是何许人？我岂敢“攻击”？

这次批判、“帮助会”开过之后，系里常派人来看我。我说，你们一直看着我干什么？他们说，防止出意外，你不要想不通。我微微一笑说，不用守着我，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他们大概认定我绝不会轻生，以后就不来了。这样，我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在漫无方向的走动中疗养心中的伤痛。

快要毕业离校了，同学们都在做准备工作，我却不能毕业。为了免得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从3月中旬至5月中旬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常常走到复旦后面偏僻的一隅，自我流放。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晚，有时走，有时停，有时清醒，有时迷茫，如一个孤魂。

◇ “待分配”的煎熬

1974年4月，复旦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系里宣布了分配方案：有几个留校，有几个到北京，大多数“哪里来，哪里去”。回到原来所在的省市，由当地有关部门再分配。只有我，“待分配”。据我出事之前听来的朦胧的消息，我很有可能留校或者由国家统配。我认为，如依据学业的优劣，让我留校或去北京，理所当然，恰如其分，不算优待我什么。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我的预期及自负击得粉碎。我变成苦苦等待发落，祈祷不要给顶“反革命”的帽子，哪怕回乡种田务农，过一辈子清贫但太平的日子。

公布分配方案的会议刚结束，系总支和工宣队找我谈话，问我对分配方案有什么想法。我说：“没什么想法，希望尽快处理我的问题。”他们说：“我们也很急，希望你不要反复。”所谓“不要反复”，意思是不要翻案不承认错误，免得事情更复杂。半是警告，半是安慰。泰山压顶，

我被压得动弹不得，还有力量“反复”吗？

4月初的一个午后，拍毕业照了。春阳明媚，校门对面的南操场北端的草坪新绿竞出。拍照之前，同学们三三两两说着话，笑容阳光般的明丽。只有我游离于众人之外，一脸阴霾。3月26日批判检查会的情景，挥之不去。拍照时，我拖着沉重的双腿，站在后面，面无表情。回到宿舍，有人来统计需要毕业照的人数。我答道：“不要。”我不要复旦的毕业照，这张照片已经深深地刻录在我的脑海中，抹也抹不去。要它干甚？

4月26日，大礼堂（即相辉堂）里召开全校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生欢送大会。会议结束，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在会场的走道里等党委书记侯占民。侯由台上走下来，我迎上去说：“侯书记，我想同你说几句话。”侯书记猜到我要跟他谈什么，回答说：“现在没时间。你的毕业稍微等一段时间，我们还会找你谈的。”

确实，他们已经找我谈过了。在中文系公布分配方案那天，系总支找我谈过之后，Y老师也到宿舍找我谈话：“党委对你的问题很重视，我们支部还要写个关于尽快搞好你毕业分配的请示报告。你心里不要太急，稍等几天。”又说：“党内也许要处分，也许校党委研究后认为既然认识了，也就算了。”

◇ 来自老师和同学的保护

校党委、系总支究竟如何研究处理我，当然非我所知。到了“四人帮”粉碎，朱永嘉被审查，通过Y老师的揭发，我才知道底细。原来，朱永嘉迫害我以后仍不歇手，不放我走，说等运动结束后再处理。又说，等请示徐景贤（“四人帮”余党，时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等他点头”才能放人。对于朱永嘉的做法，中文系总支、支部及许多教师很反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他们一致认为我出身好，学习好，历史清白，为人正直，这样对待一个入世未深的年轻人，太过分了。于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把我尽快从复旦放出去。

36年后，到了2010年的春天，女同学J告诉了我一些内幕：她作为学生代表，结合进了系领导班子。在中文系研究如何处分我时，代表学生发了言，大意是：龚斌的言论主要是对江青同志、对“样板戏”有看法，就这么几条材料。议论的场合多数在宿舍，有的是范围很小的讨论会上，说不上是“散布”，所以不产生实际影响。他出身好，学习很努力，治病救人，不要过重处理。最后我被从轻发落，与当时的系总支、创作专业的一些老师的保护有关。我对他们不仅没有怨恨，甚至心怀感激。在危难时刻给我帮助的老师 and 同学，至今仍记得他们。

5月10日晚上，支部召开会议，宣布处理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这是最轻的党纪处分，出乎我的意料。我庆幸没有成为“反革命”。至于我为什么会遭到迫害，深层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得了处分还要心怀感激，为什么可以随意把稍有不同见解的人说成“错误思想”，可以利用权力动员群众整他，法律依据何在，人有没有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权利……所有这些问题，当时不可能思考，更不可能达到深入思考的水平。那是一个不让人思考的时代，独立思考是有罪的。

◇ 离开伤心之地

5月17日中午，在我中学时的好朋友的帮助下，终于离开复旦，踏上了吴淞开往崇明南门港的轮船。望着万顷江波，回想三年前也是在这条航线上来复旦，何等踌躇满志，而如今凄凄惶惶，免不了生出一些伤感。

回故乡几天后，我拿着复旦党委组织部的接转关系的介绍信，来到县委组织部，经办人给我开报到单位的介绍信，信上赫然一行字：堡镇崇明化工厂。两个月来为分配忐忑不安，现在靴子终于落地。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毕业后做了工人，“哪里来，哪里去”，并且还收获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命中注定我要当两年半的工人，让我再尝尝人生的艰辛，再吃吃中国政治的苦头。

艰难的路还刚刚开始。莫测的苦难正等着我。

□ 《南方周末》2013年8月22日

~~~~~

【文革一页】

在大连，他给林彪当贴身勤务兵

• 刘永路 •

提起巩月江的名字，许多大连人耳熟能详。这位解放军210医院理疗室的军医，是全军有名的学雷锋标兵、全国拥政爱民模范，荣立过一等功。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在大连南山枫林街一栋神秘的别墅里，他曾给林彪当过贴身勤务兵，亲身经历了“九一三”事件前后的大波大折。

近日，笔者对巩月江独家采访时，他首次披露了那段鲜为人知的秘闻，从一个侧面细节反映那段特殊的历史和林彪其人其事。

◇ 一身好水性，一手好枪法，他走进八五大队那座神秘大院

1952年1月，巩月江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一个农民家庭。家乡四周都是湖泊和芦苇荡，出门的唯一交通工具是划小船。属龙的巩月江从小在水中长大，练就了一身潜水摸鱼的好水性。巩月江升入初中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便在村里当了小学教师。他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画大幅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宣传油画，成为村里人见人夸的“小秀才”。

18岁那年秋天，巩月江在湖里划船捕鱼，岸上一个军人向他招手：“喂，小鬼，想当兵吗？”巩月江顾不上搭腔，一个猛子扎进水底，不一会儿，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被他甩进了船舱。巩月江不知道，那位军人是八三四一部队八五大队的一位连长，他正在山东全省挑选特招兵，此行，他还受托为林彪的老婆叶群物色一位能陪游泳的内勤人员，当时，他一眼看中了这位水性高超的机灵小伙子。那天晚上，他找到了巩月江家中，动员担任生产队长的巩月江父亲让儿子参军。巩月江不知就里，一个劲地问：“是当空军还是当海军？”那位连长回答：“甭问那么多，反正比空军海军都好！”

列车把巩月江等六位特招兵拉到辽宁丹东。他们被编入新兵连连队，经过一段紧张严格的新兵训练后，又冒着冬季严寒，野营拉练徒步走到大连，到旅大警备区司令部报到。不久，巩月江被分配到驻扎在大连南山大庙及枫林街一带专司负责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八五大队。

当时，大连中山区南山枫林街附近有一栋林彪居住的别墅，这栋建造美观的别墅是当年张作霖在大连的住所。自林彪在这里安家后，八五大队便驻扎在附近一带。为安全起见，将这栋二层别墅连同周围的十几栋别墅围成一座厚厚的防弹高墙，墙上架设高压电网，周围设置了三四层岗哨，四处还布有暗哨。别墅内建有地下防空洞，还自备了发电机、制氧机和燃气锅炉。

1970年底，巩月江走进了这座神秘的大院，此后，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他一步也没有迈出过这座形同监狱的高墙。

自从走进高墙大院的那天起，巩月江就开始接受严格的保密训练和擒拿格斗训练。他脑子里始终绷紧一根弦：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自己知道的也不对任何人说。即使给家里写信也不能丝毫暴露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信写好后不能封口，要接受保密检查。对于被警卫的“首长”，不许称其姓氏职务，只许称呼“首长”。而且不得走近“首长”身边（因为“首长”怕风、怕光、怕声音），要始终和“首长”保持2米以外的距离，正面接触时，也不得目视首长，只能目视前方……

高墙大院面积很大，是个天然的射击场。林彪进驻之前，巩月江和战友们天天在这里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巩月江的枪法很准，机枪、步枪、手枪射击，他几乎每次都能拿第一。为了训练打活动目标，辅助人员不停地向空中抛土豆，他一枪一个，百发百中。他的精明强干，使他在八五大队200多名警卫战士中脱颖而出，最终被选定为首长最贴身的三名内勤警卫之一。

◇ 陪叶群游泳，为林彪挤牙膏、洗内衣，叶群说：“走了，照张像吧”

1971年3月中旬的一天，叶群打前站，乘专机飞到大连，住进南山别墅。进门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吩咐巩月江立即打电话找外勤人员，到停在周水子机场的专机上取水。原来，林彪每到一地，日常用水都用专机运送。

第二天，林彪乘专列抵达大连，住进了南山别墅。在巩月江的印象中，“首长”特别怕风，从来不到室外走动，他的卧室直通车库，坐车外出也无需出门。林彪生活很有规律，他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先去卫生间洗漱。别墅里设有两个卫生间，两条大走廊，巩月江提前为他放好洗脸水，挤好牙膏，林彪从中央走廊进来的时候，巩月江便从旁侧走廊离开，一般不与“首长”发生正面接触。洗漱后，林彪喜欢在走廊里散散步。他在一条走廊里走动时，内勤人员便绕到另一侧走廊，避免和他正面接触，但却在暗中保卫和监护着他。林彪的早餐很简单，由巩月江负责摆放，用一个小木筐盛着，通常是一碗粥，一块清蒸武昌鱼，三四碟小酱菜。

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林彪会坐进一楼挂着防空窗帘的宽大办公室。这时，巩月江按动一个电钮开关，伴随着一阵马达轰鸣声，天棚上的铁皮门徐徐拉开，阳光透过天窗直射到林彪的身上。林彪一边看报阅览文件，一边享受着日光浴。有时，他边作日光浴边听下属作汇报。

作为贴身内勤人员，“首长”的吃喝拉撒睡都要的细致入微地照顾到，巩月江甚至还负责为林彪洗内衣内裤（这些活儿叶群是从来不做的）。但是，林彪从不关心下属的事情，他每天心事重重，沉默寡言。巩月江在贴身警卫侍候林彪的十余天里，林彪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也很少和秘书讲话，巩月江几乎从未听过林彪讲话的声音。

与林彪比起来，叶群的话较多，但她的生活毫无规律可言。她每天晚上八九点钟要在一楼室内游泳池里游泳，每次游二十分钟左右。泳池不大，三十平方米左右。叶群的贴身女内勤不会水，只能站在泳池边上为她拿浴巾。她比巩月江大几岁，每次都是这位护士大姐吩咐巩月江：“小巩，你下去陪首长游！”于是，巩月江便下到泳池内不离左右地看护着叶群。游完泳，叶群便上二楼看电影，大都是外国影片，一看就是下半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很晚，早餐单独吃。

林彪夫妇只在大连住了十余天，叶群就多次报怨说，“住不惯，首长在这里水土不服。”巩月江心里清楚，其实，更主要原因的是，她嫌游泳池太小，水质也不好。

有一天，叶群突然提出要去北戴河，临行前，她对巩月江等三位内勤人员说，“本来想请你们几个人吃顿饭，下次吧。走啦，咱们一起照张相吧！”叶群和三位内勤人员在别墅门前的二层台阶上合了影。这张照片，后来却成为审查巩月江的“罪证”被没收了。

◇ 为林彪夏天入住别墅，构筑一个巨大的“牢笼”。一盒大生产香烟，改变了他一生命运

自从1971年3月林彪夫妇离开大连后，巩月江和八五大队的官兵一直原地待命，为“首长”夫妇夏天入住大连做好一切充分准备。

林彪对居室温度的要求很苛刻，必须保持恒温20摄氏度左右，温差浮动不得超过0.5度，这可给工勤人员出了个大难题。1971年的夏天特别炎热，七八月份的时候大连已经热气蒸人。那时没有空调，只能用冰块降温。可是，每天运来那么多冰块摆放屋内，室内温度虽然下来了，但潮湿度却增大了。这可如何是好？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派施工队在别墅外围建筑了一个巨大的木笼子，用厚厚的苇席把别墅“包裹”起来，上面只留了一个“天窗”，方便首长日光浴。从外观看，这个奇特的建筑，好似当时大连动物园那个巨大的圆拱形老虎笼子，当时谁看了都觉得像“牢笼”，但谁也不敢说出口。

出乎意料的是，“笼子”建成后，或许是太阴凉的缘故，别墅室内温度即使在盛夏最热的天气也低于20度。没办法，夏天也得供暖气。巩月江每天不时地盯着室内的温度表，打电话通知锅炉房，靠燃气锅炉随时调解温度。

上级通知，首长夏天入住大连。可八月份一天天过去了，“首长”却没来。九月初，上级又来了通知：“首长随时要入住”（采访时，巩月江对笔者说，他相信林彪是被儿子林立果胁迫逃亡一说，因为他们一直准备着他回大连）。就在巩月江等人做好了随时迎接准备的时候，迎来的却是“九一三事件”猝然发生，林彪、叶群、林立国等一家人坠机温都尔汗！

巩月江和八五大队等官兵由于“沾”了林彪的“光”，被隔离审查，不得走出别墅半步。在那段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巩月江看到他的一些领导和战友，有的被撤职、复员处理，有的被遣回原籍劳动改造。

有一天，巩月江从一间屋子门口经过，一眼瞥见一位曾负责林彪保卫工作的干部，在烟灰缸里捡烟头抽。巩月江立即想到，这位首长与外界早已断绝了一切联系，他一定是香烟“断顿”了。常年的养成，使巩月江形成了一种素养，他总能最敏锐地查觉到对方需要什么，出于本能，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为对方提供帮助，否则，他会觉得良心过不去，浑身不舒服。于是，他从自己每月六元钱的津贴费中掏出三毛九分钱，找一位熟悉的通信员，从街上买了一盒大生产香烟。

“首长，缺烟了吧，给你一盒烟！”见到香烟，那位首长又惊又喜，两眼放光：“小鬼，你怎么知道我没烟抽了？”“我看到首长都到烟缸里找烟头了！”那位首长很感动，“哎呀呀，你这个机灵鬼，真是雪中送炭啊！”几个月后，这位首长官复原职。临走时，他没有忘记巩月江，特意把他招呼到自己跟前，说了一席贴心话：“小鬼，别在这儿呆了，早点出去吧，我已经给旅大警备区谢政委推荐你了，你去给他当警卫员吧！”

就这样，巩月江解除了长达半年的审查，保住了他一直喜欢的这身军装。他至今还经常念叨：“是一盒香烟改变了我的命运！”后来，他提了干，上了学，当了军医，又成为闻名军内外的道德模范人物。他几十年如一日，照顾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和病人；默默无闻地为群众做好事，隐姓埋名资助无钱读书的学生……采访时，巩月江感慨地对笔者说：“我始终记着从小母亲



对我的教诲：做人宁可自己千般苦，别给他人添一分难。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尽力帮人一把。”

□ 原载《党史纵横》2013年第12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